第一章　面對審判

耶利米遂答覆官員和全體人民說：「是上主派我預言你們剛才聽到的一切反對這殿和這城的話。現在你們應該改善你們的品行和作爲，聽從上主——你們天主的勸告，上主就必會後悔自己曾決意要給你們降的災禍。至於我，看：我已在你們手裡，你們看著怎樣好、怎樣對，就怎麼對待我。但你們卻要切實知道：你們若殺害我，便是給自己和這城與其中的居民招來無辜的血債；因爲實是上主派了我來，給你們當面宣布這一切話。」

——〈耶利米書〉二十六章十二至十五節

其實，我們並不須要借助於任何神力或先知的異能，便能夠進入李政男生命中每一個幽黯的、不爲人知的角落——預言、以及紀事。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德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宣布了二十二名德國A級戰犯的判決。戈爾馬·沙赫特坐在被告席前排的最左側，隱約可以嗅到隔座瓦爾特·范克鼻息間噴出的蒜味。然而沙赫特毫不在乎，他滿心歡悅，虔敬地讚美上帝，因爲他是二十二名A級戰犯之中三個無罪開釋的幸運兒之一。他當然無從想像：從這一天起，有十七個未經專業訓練的憤怒猶太狙擊手將要不斷對他展開拙劣但無情的攻擊，使他的晚年充滿愚蠢且恐怖的玩笑。不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無法燭見未來的沙赫特的確感受到生存在這個世界的無上幸福。

同樣的一個日子，我們的李政男卻感覺著幸福——以及這整個世界；正在離他遠去。他必須要等到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時刻，才會從廣播或報紙得知那個其實他一點兒也不關心的戰犯大審的消息。現在，他祇關心手上捏著的一張油印表格。那是一張由盟軍麥克阿瑟總部所設計的調查表，透過戶政單位和各種會社、學校分發給此刻居留在日本的台灣人填寫。表格上除了個人基本資料之外，最顯著的一欄寫著：是否願意遣返？

「是否願意被當做戰犯一樣地遣返故鄉」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句子。如果他是戰犯——就像那些在中國大陸或者台灣放下武器、登上艦艇、被運回日本的軍人一樣；那麼倒還有單純的、返鄉的喜悅。然而我們的李政男卻不能這樣想。他的日本名字是岩里政男，出生日期是大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身分是京都帝國大學農業經濟系二年級的學生——太平洋戰爭

末期並且由日本軍部飭令編入預備士官班接受訓練；終戰之後，他既失去了、也重新獲得了陌生的身分。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一日的夕陽同時穿過不甚潔淨明亮的玻璃窗，斜斜地睨視著李政男遲遲未曾填寫的身分資料，還有那個看來猶似判決的選擇題：是否願意遣返？

整整十四年之後，一個在晚年愛上可口可樂、飲之成癮的老情報頭子問到他這一點：「當時，你好像不大想回台灣？」而他立刻撒了一個小謊：「沒有沒有！我很想回台灣，我很快就回來台灣了。是的。」

可是資料上不是這樣說的。我們的李政男不得不被提醒一下：「你再想想，你是怎麼回來的？」老情報頭子端起桌上的釅茶，啜了一口，伸舌頭舔去殘留在嘴唇上的茶葉，笑起來：「我看李先生的記性不是很好。這樣罷，李先生，咱們來練習一下——你剛才是怎麼來的？」

「坐船，我在基隆下船，就直接回——」

「李先生，你不要緊張，我現在問的不是你回台灣的事，我問的是你今天怎麼來的？」

「是的，今天是一位牛處長派車接我來的。」

「什麼車？」

「黑色小轎車。」

「幾個人去接你？」

「呃，這個、呃——兩個。一個司機、呃另外一位是吳先生。」

「你們在車上談過話嗎？」

「好像有談過。是的。」

「談了些什麼？」

「呃，不太記得了。」

「你仔細想想。」

「祇是幾句聊天的話，隨便聊的。」

「怎麼聊的？李先生。」

「他問我——」

「誰問你？司機還是吳先生？」

「吳先生問我對省政府馬上要實施的『保護自耕農辦法』有什麼看法，我說很好哇。吳先生說自耕農買地政府祇貸款百分之二十到六十會不會稍微低一點，我說不會。他又說利息呢，我說百分之五很優惠。他說這是農復會的看法還是我個人的看法，我說我個人的，他說那農復會有什麼看法，我說應該也是全力配合政策罷。是的。吳先生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之後呢？」

「沒有什麼了。」

其實我們知道，李政男在耕者有其田的話題結束之後，爲了表示親近，還多說了一句：

「家父也是從事警察這方面的工作的。」

可是吳先生立刻瞪了他一眼：「我們可不是警察，你要搞清楚。」

我們的李政男從那一刻開始緊張且胡塗了起來。下車的時候他的天靈蓋撞到白鐵皮門框護邊，抬手一摸頭又綳落了一粒西裝紐扣，他把紐扣拾起來，放進褲口袋裡，像個學習點字法的盲人一樣，用指甲和手紋摩挲著那粒紐扣頑硬而粗糙的紋理。

吳先生在這時帶他穿越了幾條曲折繁複的迴廊，天光不知在何處完全隱退。李政男於是走進了一盞接一盞照亮這個小世界的日光燈束裡。這是一幢當年日本人建造的仿歐式高大建築，某些部分的地面或樓梯台階又在戰後的十幾年裡被國民政府所雇用的建築人員砌上了一層薄薄的花崗岩片，並打磨得似水鏡般明亮光滑，甚至可以清楚地映照出低頭行走的李政男那副略比普通人長一些的下巴的角度。李政男就這樣一步一眼睇視著自己的腳尖踩一下自己的下巴地走著，褲袋裡的紐扣都彷彿給捏出了濕膩膩的油水。吳先生忽然停住了腳步，花崗岩貼片也行到盡頭，再往前兩寸，便是另一截新鋪過紅色塑膠防滑地毯的樓梯，順勢看上去，吳先生的聲音也同時響起：「李先生，這是我們牛處長。」

一我們見過的，政男兄。一牛處長微微俯了俯身子，卻沒有下階趨前的意思，不過他伸出一隻白皙溫軟的胖手，緊緊握住李政男的汗掌：「政男兄可能不記得了；幾年以前，我們談過話，那是在保安司令部的時候，西寧南路峨嵋街口。呵呵呵，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是的是的。」

就在這一刻，樓上又下來兩個人。後頭的是個戴著白鋼盔的憲兵，前頭的是個不停在咳嗽的瘦小男人，直楞楞的鼻梁上掛著一副黑色寬膠框的深度近視眼鏡，他瞥了李政男一眼，隨即又咳了兩聲，並且謹愼地朝右避開半尺，和李政男錯身而過。牛處長卻在這個時候一昂嗓子喊道：「王兄！」

「有！」姓王的瘦小男人像個應答點卯的士兵一般扯開攪著濃痰的喉嚨答了一聲。

「少抽兩根兒。」牛處長說著，手下一使力，拽起李政男的胳膊，逕往樓上走去。李政男聽見身後的男人又喊了兩句：「是處長，謝謝處長。」

這顯然是未來四個半月之內，李政男聽到的最後兩句不屬於這幢建築物裡的人的聲音。

「你的案子比較特別，局長——」牛處長隨即鬆開手、壓低音量，道：「局長交代，一定要請高層的長官來協調一下。所以我們特別從情報局請來督察室的主任古將軍和你談談。」

「要談多久呢？處長，我還要回——」

「農復會那邊我們已經替你請了假了，家裡也會有通知，你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到了這裡，再安全不過的。至於待多久嘛——老實說：完全看你政男兄怎麼配合了。」牛處長說到這裡，再一次握了握李政男的手，然後用他那兩層肉顫顫的短下巴尖朝前抬了兩下。這是一條單面有窗的長廊，終於日光再度從右側嶄露。李政男沿著紅色塑膠氈的中軸線朝長廊盡

頭走去，我們的老情報頭子正在一扇緊閉著的巨大木門裡坐著等他。

老情報頭子在還不算太老的年歲就悟出了——倘若逮捕他的是共產黨，即使拔掉他幾片指甲蓋兒，他也要否認自己是國民黨，倘若逮捕他的是國民黨，即使鑿掉他兩顆大牙，他也要否認自己共產黨的身分。可是，逮捕他的是中島欽也。中島欽也戴著一副白手套，左手的一隻外頭另套著一隻灰不灰、褐不褐的塑膠皮手套，這隻手從老情報頭子的短褲衩筒子裡伸進來，捏住他的一粒陰囊，對他說：「我們不在乎你是哪一黨。你是敵人！」隨即把那一粒陰囊捏碎了。他在昏迷中認識了人生第一信條：人是有敵人的動物。而身爲一個必須隨時改變自己身分的情報人員，則必須隨時發現、瞭解乃至於製造敵人的意義。

我們的李政男是老情報頭子的敵人嗎？後者打個呵欠，沖了第二泡茶，搖搖發痠的脖兒梗，然後隨手翻了翻當年李政男第一次被捕的檔案。這一刻，我們的李政男還坐在南海路農復會的冷氣房辦公室裡，抬頭看見那位前來接他的吳先生，吳先生說：「什麼都不必帶，車子已經在樓下等了。」而老情報頭子則聽見敲門聲，他沒吭氣，接著，大木門應聲開啓，一個身材瘦小、掛著副深度近視眼鏡的男子進來了。

「你是王宇？」老情報頭子打從一開始便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他繼續翻看著李政男的那份檔案。上頭有一行字，旁邊被不知道什麼人用硃筆密加圈點：「這段期間每星期上教堂五次，潛心研究基督教教義。」他用鼻孔哼了一聲。

「是，將軍。」

「你的案子比較單純，我們祇是想瞭解一下，你在抗戰期間的活動。」

「我老家在山東，到我父親那一輩上，全家搬到天津，我在天津上的學——」

老情報頭子抬手止住他，一雙眼睛仍舊盯著桌上的檔案，那裡寫著：「住歸綏街二十六巷四號，每日騎自行車至台灣大學任助教。」這時，老情報頭子皺了皺眉，半晌之後，才對王宇說：「我講過了，你的案子比較單純，我祇問你在抗戰的時候做些什麼，不是要你的家譜，好罷？」同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枚銅板來。

王宇點了點頭。

「你是演員？」

「是，將軍。」王宇鼓足了眞氣答道：「當年做流亡學生的時候就開始演戲。」

「在什麼地方演？演些什麼？」

「部隊開到哪兒就上哪兒演；有的時候在街上、有的時候在廟裡，學校啦、戲園子也演過的，反正都是些抗日的戲，一些激勵民心士氣的戲。」

老情報頭子再度垂下頭去，看見一張顯然是日後補充、所以紙張規格完全不同於舊檔的附片夾在下一頁的文件之前，而且用銅釘釘死，變成正文的一部分，內容則是打字油印而成，大意是說：一九五一年，李政男獲中美基金會獎學金，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爲期一年半。老情報頭子撥弄著那枚五角銅板在桌面上打旋子。

「那你都演些什麼角色呢？」

「這——」王宇搔了搔後腦勺，咧嘴笑了起來：「報告將、將軍：演、演日本特務。」

老情報頭子這是第一次正眼打量面前這個可以是人犯、也可以不是的傢伙。

「沒法子，我就吃這長相的虧。」

老情報頭子「嗯」了聲，道：「你方才沒說清楚：都到過哪些地方演戲？」

「是，到過很多地方，洛陽、開封、上海，大後方也去了，在重慶待得最久。」

「沒去過山東？」

「呃去過的，去過的。」

「你是郭沫若總政治部旗下演劇第九隊的，當然去過山東囉！」

王宇這回祇點了一下頭，沒說話。

「你認識郭沫若？」

「不認識——我知道這個人，但是不認識。我祇管演戲，給部隊演戲嘛！」

「你不知道郭沫若是共產黨？」

「不知道！將軍，我眞是不知道！」

「你不是共產黨？」

「當然不是將軍我反共的我！」王宇激動地叫起來，差一點要站起身，卻被一陣咳嗽給嗆回椅子上，咳罷了還咻咻喘個不停。

老情報頭子咧嘴笑了，他盯住王宇那兩隻連酒杯底一般厚實的鏡片也蓋不住的眼袋子，逼視良久，才道：「你是演員？」

「是演員。」

「不是特務？」

「不是特務。」

老情報頭子又用食指和拇指轉起那枚銅板來，它飛快地打著旋子。理論上，這銅板祇有一個支點接觸著平滑的桌面，所以它隨時可能向任何一邊傾倒；其中的一邊，浮雕著國父中山先生的半面頭像，另一邊則是夾著台灣省地圖的「五角」兩字。這是一枚新鑄的銅板，湊兩個可以買一碗牛雜麵。不過，當它作爲一種審判工具的時候，價值會高很多。老情報頭子趁念頭尚未閃過之際順手掩住了銅板，讓它幾乎不發出一丁點兒聲響地倒在桌面上。然後，他把手掌輕輕移開一寸，國父微笑的側臉露出來。

「不是共產黨？」

「絕對不是共產黨。」

「你——回去吧。」

王宇愣了一下，看見老情報頭子向前伸舉手臂，用手背和五指朝他微微揮了兩下。他試探地站起來，向旁邊挪了一步：「將軍！那——我可以告辭了麼？」

「去罷！多演幾齣好戲給我們看看。」

事隔多年之後，老情報頭子經常抱著罐可口可樂，坐在十坪不到的客廳裡，跟他的孫女兒指著電視螢幕上的王宇說：「這小子我抓過他。」更多的時候，他也會看見電視新聞裡的李政男，而在那樣的時刻，老情報頭子會灌上一大口可樂，感受千軍萬馬的氣泡沖頂喉頭的快意；接著，他就笑了，再一次反芻著一九六〇年仲夏日午後那次審問的諸多細節。

「我需要很多細節，李先生，所以剛才請你這樣練習一下，希望你能諒解。」

「是的，我明白。」

「如果你一次能夠把細節說得很清楚，我們不會問第二次。」

「是的。」

「可是你這趟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表示還有些交代並不清楚。」

「是的。」

「此外呢，我還要提醒你一點：我們雖然知道得越多越好，可是李先生，請你不要『編』，『編』你懂嗎？」

「我懂，我不會亂講。」

「對了！」老情報頭子突然用力一拍桌子：「對了！是什麼就說什麼，有什麼就說什麼；不是的沒有的我們不要。有的人問他一次他說不知道，問他兩次他說一大套；可是我們有的是時間，再問第三次，又和第二次對不上了。沒關係，我們還可以問第四次、第五次。你祇要把握一個原則：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就行了。我們這是彼此幫忙，你幫我們省

時間，我們幫你瞭解你的問題。」

「是的。」

「還有一點我們也希望你能瞭解，李先生。這——不是約談，是偵訊。你呢，和其他人的情況也不大一樣。像方才那一位，人家沒有任何案底，我們再一研判，沒有問題，就放了。你不同，你是經過法定程序簽報、奉准核可以後逮捕歸案的——」

「我不是，我是自首的。」

老情報頭子猛地把桌面正中央那一份厚重的檔案豎起來，有如兩扇大門一樣遮住了自己的臉，沉聲道：「自首是還沒抓你你自己跑來了叫自首。李先生，上一回你留下這些案底的時候，是自首嗎？」

我們的李政男深深吸了口氣，垂臉望著胸腹之間的西裝外套上脫落紐扣處的半截線頭，被一陣強風也似的鼻息吹得彎了腰，久久不能平復。

「你已經算是非常非常之走運了。民國四十年夏天你還能夠出國留學，這是絕無僅有的例子。更別提什麼娶妻、生子、在大學裡教著書、還到公家單位裡兼份差事。這種福分，你是不是該珍惜一點才好呢？李先生。」

李政男抬起臉，對方依舊給掩在那份檔案的後面，祇留八根手指頭彈著手風琴一般地輪番敲擊著檔案的藍布包殼封套。

「李先生？」

「是的。」

「好！那麼請你記得：你從來沒有『自首』過，你唯一的機會是『自新』——就像上回一樣，跟我們合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是的。」

老情報頭子這時才緩緩放平檔案，把張臉露出來，帶著和悅的笑容，說道：「坦白說我是主張讓所有的人自新的，願意自新就統統自新。嗯？」

李政男勉強回了他一個轉瞬即逝的微笑。他知道自新是怎麼一回事，他必須說出一些人的名字、一些地方、一些時間、一些說過的話和一些發生過的事，當然，還有一些想法，他自己的想法、他猜測別人可能猜測他會有的想法……諸如此類。

我們的李政男已經自新過一次，現在他又來了。他想像著：幾個小時的談話過去之後，他將會鬆一口氣，神清氣爽地走出這個房間。如果天還沒黑，廊窗外的陽光會把他腳下的影子拉得更長一點。走過長廊、下兩截樓梯，穿越一條又一條迷宮也似的走道，黑色的小轎車就在門口等他了。他們會把他送回農復會——至少他會這樣要求，他們也因此而益發相信他畢竟是個安分守己的公務員；這個公務員要騎上他的自行車，吹著口哨，迎著晚風回家。自新——在某種意義上；和他這十年多以來所逐漸親近的宗教儀式有著多麼神似的地方：把自己交給一個擁有無上權柄的主，向祂告白而無隱諱，向祂乞憐而無慚悔。是的！箴言如此教

諭李政男：恪守上主誡命的，可保全生命；輕視上主道路的，必自趨滅亡。是的！李政男開始默誦他牢記在心的箴言二十一章：上主鑒察人心。君王的心在上主手裡，有如水流，可隨意轉移。人對自己的行爲，都自覺正直；但審察人心的，卻是上主。……

「那麼，讓我們回到最早那個問題。」老情報頭子清了清嗓門兒，道：「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你在京都帝國大學的宿舍裡領到一份調查表；當時，你想立刻回台灣嗎？」

「我——」

「讓我先提醒你李先生。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你在台灣大學唸書的時候和另外七個同學合租一套校外宿舍，有一天晚上你和其中的一位說：『當時想乾脆不回來算了，做台灣人眞沒意思。』有這話沒有？」

「呃，我不是很記得了。」

「你可以想一想。」

李政男抿緊了嘴唇，聽見老情報頭子放了個響屁。他輕輕閉上眼，跟自己點了一下頭。俯求上主鑒察：如果他曾經這樣說過，也一定不是他們——那些道聽塗說的出賣者、蠻橫跋扈的外來統治階級；所能理解的。上主，我的言語不是他們所能理解的，不是任何人所能理解的。

「那麼可不可以請你解釋一下，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應該這樣說：台灣被滿清政府割讓給日本五十年，做日本人的順民『眞沒意思』，是不是這樣想比較有道理呢？」

「呃、這個——」

「我想是這樣的罷？」老情報頭子也跟自己點了點頭。他沾著唾沫，再翻一次夾雜著筆錄、自白書、跟監報告、秘證文件等等資料，跟前也閃逝著一幕一幕他從來沒見過、卻歷歷如繪的景象。這時，他暫停在這樣的一幕前面：一個薙了頂小光頭、穿一身深色舊西裝、足蹬高齒木屐的老者迎面走來，容色哀戚，胸前捧著一幀年輕人的遺照。老者身後左側半步之遙的地方，則是高出一個頭有餘的李政男。我們的李政男緊緊抿著嘴，略微昂著一副長下巴，舉步之間仍凝睇非常遙遠的地方。老情報頭子在這一刻歎了口氣，問道：「令兄是在抗戰期間教鬼子給拉伕拉到南洋去的？」

「是的。」

「一直沒回來？」

「沒有。」

「聽說令堂就是因爲思念令兄，過度傷痛，一病不起的，是嗎？」

李政男深深一頷首。

「如此一來，『做台灣人眞沒意思』應該是對日本統治不滿，而不是對國民政府不滿，是這樣的嗎？」

李政男的腦袋已經垂得太低，以至於很難有角度讓他再點動了，他祇得咬緊牙根，答了一聲：「是。」

「不過，像李先生這樣從小受皇民教育長大的人，又碰上令兄、令堂這樣的遭遇，心情一定是非常複雜的囉？」老情報頭子捧過已經涼透的玻璃杯，就近嘴邊，喝了一口，在嘴裡咕嚕嚕、咕嚕嚕漱了幾下，才嚥下去：「嗯？」

我們的李政男遲疑片刻，察覺這番話很可能是一個圈套——一個塗染著溫情蜜意的圈套，於是他立刻撐直了已漸癱軟的上半身，答道：「沒有。我是中國人，沒什麼複雜的。」

「哦？」老情報頭子把茶杯「碰」的一聲放回原處，搶道：「那麼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七號晚上你在住處說：『他們中國人在上面做官、做皇帝的都是自家人。』你還跟另一個同學大吵一架，你說：『毛澤東是蔣介石的大舅子，是奉化毛夫人的弟弟。』這——兩段話又是什麼意思呢？李先生。」

「我沒有這樣說！我沒有說過這種話！沒有！」李政男的兩隻手十根指頭狠狠摳住座椅扶手，但是他的臉卻掙扎著撇向一側，正迎向邊窗上透射進來、時刻西斜的夕陽。

老情報頭子終於起身離座，緩步走到窗前，伸手試了好幾次才把兩塊棗紅色的絨布窗帘給拉上。室內倏忽暗了下來。李政男一時間什麼也看不見，祇聽到老情報頭子像是伸了個懶腰或者因爲什麼疾苦那樣長長地呻吟了一聲：「欸——！」

等到視覺逐漸恢復以後，老情報頭子已經翩然坐回原位，文風不動地瞅著他，久久不眨

一眨眼珠子：「李先生，我看你是回不去了。這樣罷，我們從頭開始，好嗎？」一面說著，李政男一面聽見另一個聲音「豁瑯瑯瑯」一面說著，的手裡正把玩著一枚五角錢的銅板，一面是孫中山的微笑，一面是台灣省的地圖；這是一枚注定祇能向某一側傾倒的銅板，而上帝正假手於我們的老情報頭子來決定它傾倒下去所顯現的意義。

「我們重新來過罷。」

事實上，李政男在這一刻之後再也不曾見過對方的面、聽過對方的聲音。老情報頭子隨即重重地闔上檔案、把銅板收回口袋，兩大口灌乾了杯中的殘茶，嚼著茶葉，一步一步邁出房間去。

黑黯中的李政男完全無法理解：他拚鬥了三十七年的生命、一段如此坎坷、如此艱難、又如此珍貴的生命爲什麼還不如兩口殘茶和幾片茶葉渣子來得重要？那個幾乎像上主一樣控制了他一下午的人物一扭身便消失了，消失之前居然還教他「重新來過」。

從此刻開始的四個半月之內，我們的李政男每天都要重新回到他過往三十七個年頭的生命之中的各個角落裡去，時喜、時憂、時悲、時樂，在無法回憶的許多片段裡——比方說：早餐時托著個鋁盤去盛稀飯、撿饅頭的那一剎那；則感覺到無比頑強、堅硬且巨大的恐懼壅塞在每一個毛孔之中。通常在這樣的時刻，他會用力咬緊上唇，讓鼻翅兩側的法令紋愈陷愈深；這樣做可以使眼角不易過於濕潤、視線也不致突然模糊。但是，他仍然會聽見自己的聲

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喚著妻子的日文乳名：「淑米可」、「淑米可」……

此刻，我們的李政男絕對想像不到：當他七十一歲的時候，與闊別五十年的日本老友太郎重逢，腦海之中倏忽出現的一段往事居然是自己俯身打著呵欠撿一粒饅頭、以至任口水滑落蒸桶的情景。他遂用日語對太郎說：「在已往，像我們這種七十多歲的人在晚上都不曾好好地睡上一覺呢！」

其實，我們並不須要借助於任何神力或先知的異能，便能夠進入李政男在一九六〇年仲夏夜的那些個不眠之夜裡去過哪些所在。

當時，他躺在鐵架牀上舖，抻直手恰好可以用中指搆著水泥房頂，再使勁兒一摳，就落下一片雪花般輕盈的白色粉漆。這時候，下舖的小翁彷彿給驚醒了，悶頭悶聲地問他：「還不睡？」

他總要等待個一、兩分鐘，倒是小翁不死心，翻個身、歎口氣，再問：「想老婆？」

「沒有。」

「想兒子？」

「沒有。」

「那你不睡幹嘛？明天又到處流口水。」

我們的李政男再一次高舉起手臂，彷彿掌中握著一截魔杖般的樹枝：「你知道嗎？我們三芝後面山上有一條小路，從埔頭坑出來，到北勢子，然後到北新莊，一直走過去，可以到

北投呢。」

「怎麼樣？」

「一來一回差不多要一百多公里有噯。」

「嗯。」

「有一年夏天，差不多七月的時候，我帶了七、八個小朋友去走過一次。」

「嗯。」

「他們很害怕，一開始都不敢去；可是後來都聽我的啦，走了很久，差不多半天有噯。」

「走到北投了嗎？」

李政男沒有答覆這個問題。他從來不曾想起：那一次究竟走到終點了沒有？他祇記得手裡握著一根長樹枝，走在小小隊伍的最前面；如此而已。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握有某種力量、某種權柄。

「你這故事眞他媽蹩腳！」

我們的李政男沒聽見這句話。

第二章　自由的證據

在派遣我們入世之前，上帝對人的一切行爲、心意和企圖早已確知不誤；是祂把這些企圖放在我們身上，也是祂安排了我們周圍的一切——使這種或那種事物在此時或彼時出現，供人選擇；這一切都是祂預知的。但是祂並不逼迫我們這樣做。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李政男這一輩子從來不知道笛卡兒對上帝的支配與人的自由有過如此明確、又如此曖昧的討論。他所瞭解的笛卡兒大約止於「就是『我思故我在』的那個」。然而，這並不表示他沒有思索過類似的問題。那失去自由的四個半月裡，他經常在不及八個榻榻米大的囚室中往返踱步，推測這樣的遭遇是否屬於上帝的旨意？抑或是他自己在過去三十七年以來的種種舉止言行、以及這種種舉止言行的內在終究有一種必使之然的動因？

當這種說來非常嚴肅的心智鍛鍊正在進行著的時候，我們的小翁正在囚室面窗一角的小書桌前刮鬍子、修指甲、梳頭或者擠粉刺。小翁的桌上總有一面小鏡子，這面小鏡子並無自由意志，它必須依照小翁的安排，反射出這個世界的景象的一小部分。不過，這個部分經常不祇是小翁的下巴、指甲、頭髮或者粉刺而已，它卻隨時跟著李政男侷促狹小的動線而轉動。

我們其實看得出來，小翁的臉既不需要、也不值得那樣修飾，反射出來的那張臉的邊緣和鏡框中間，總有那麼一小塊三角地帶或歪歪斜斜的馬鞍形區域，映照著李政男沉思或喃喃自語的模樣。小翁必須非常專注地去辨識他的表情、判讀他的唇形、揣測他的心緒、研究他的肢體動作所可能顯示的意義；瞭解他的想法。

如果我們瞭解潛望鏡利用兩面反射稜鏡從事窺測的原理，就會明白小翁和那面小鏡子有著類似的處境——他們都是被安排在李政男的周圍的東西。安排者猶如笛卡兒所聲稱的上帝，早已預知了一切；祂預知，並設計進一步的窺測。

笛卡兒在給伊莉沙白公主的信上對上帝的支配與人的自由打了一個比喻。他如此寫道：「如果有一位國王禁止其臣民決鬥，而他又確知國中有兩位彼此懷恨、分別居住在兩個城市之中的紳士——倘若這兩個人相逢，又絕對無法阻止其決鬥；然而，有一天，這位國王分別命令這兩位紳士到對方所居住的城裡去。這也就違反了禁令；但是，國王並沒有強迫他們決鬥。國王仍然是具備先見之知的，此一先見之知雖然包括了他支配了兩人的相逢和決鬥，卻不能因此而認爲這兩位紳士的決鬥並不出於自由意志。」

即使從未眞正親近笛卡兒，李政男也可以從他艱難、瑣碎、支離片斷的思索之中逼近一個和笛卡兒十分雷同的答案：他相信目前所遭遇的一切都取決於自己的意志和行動。這樣看起來無休無止的偵訊、回憶、坦白、囚禁……都是他過往生命中每一刻微小的歷程的結果，那些歷程是他的自由意志使然，那麼，此刻的遭遇也必定是他的自由意志使然。他不由自主地微笑起來，這微笑反射在小翁的小鏡子裡，猛可嚇了小翁一跳。

「小翁！」李政男微微昂起頭，彷彿空氣中飄浮著一個別人看不見的答案：「你知道你爲什麼會和我關在一起嗎？」

小翁輕巧地把小鏡子收進抽屜裡，似答非答地「嗯」了一聲。

「我知道。」李政男依舊盯著半空之中那個答案說道。

「你知道什麼你知道？」

「你是被派來的。」

小翁在這一瞬間打了個冷顫，同時立刻回憶著這些共處一室的日子之中自己究竟說了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爲什麼會讓李政男如此輕易地起疑且洞悉一切？正當他驚惶不及應變之際，聽見李政男又迸出一句：

「我也是被派來的。」

「你在說什麼東西？」

我們的李政男這時又微笑了，繼續說道：「雖然我們都是被派遣的，可是我們還是自由的，是我們自己決定要做什麼、就去做什麼的。是的。」

小翁重新把小鏡子從抽屜裡摸出來，假裝擠一顆粉刺，在那顆根本不存在的粉刺旁邊，李政男逕自點起頭來：

「你還記不記得有一次我跟你說我們一群小孩子要從三芝走去北投的故事？我跟他們說要去。有要去的，也有不要去的，也有說要去後來又不要去的。我就說我們大家來投票，不敢去的舉手，那結果通通沒有舉手的，那我就說好，是你們自己要去的。人就是這樣，事情就是這樣，我們自己要做什麼就會去做什麼，是這樣的。」

話似乎就這樣講完了，李政男並沒有說明白：到底他知道了什麼？或者什麼人「派」了小翁、又「派」了他。

小翁在這一天——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下午四點二十分的例行秘密彙報上儘可能巨細靡遺地反映了這一段談話過程。

我們的牛處長眉頭緊鎖，不時地咬兩下下嘴唇，過了好半晌才勉強抬了抬那隻肥軟的右掌，對小翁說：「你沒問下去？什麼叫『被派來的』？」

「再問，反而多露一番形跡。」

「這倒也是，不過，他這話裡好像別有玄機。你想，他會不會想『詐胡』？」

「報告處長！從來沒有人敢在這裡撒這個野。而且，這小子也不像——」

「你的意思是說：李政男的『後頭』另外眞地有『人』？」

「報告處長！這我可不敢說，應該不至於——」

「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輪不到你來說！我要聽的是證據；你要做的就是找證據。」

而證據，在上帝那裡。倘若誠如我們的李政男所想像的那樣：我們都是上帝派遣到這個世界上來、而又在此一支配之中能夠遂行我們的自由意志的話，我們的自由意志其實比一間佔地八個榻榻米的囚室大不了多少，我們也必將在兒童時代、少年時代、成人乃至於衰老之後怯於舉手表示我們其實並不想從三芝走到北投去。我們從來沒有勇氣離開這間囚室。就像我們的李政男一樣；他微笑地望著飄浮在半空之中、祇有他自己看得見的答案，跟自己說：我是自由的。

在接下來的偵訊和自白之中，李政男以前所未有的細膩語氣和筆調回顧了他前半生的某

一個關鍵時刻——我們在翻閱這一段記憶的時候必須對他生澀的腔調懷抱同情與寬諒，因爲方此之前，他從來沒有機會親切地體會或者使用這種語言；這一天是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的清晨。這一天，在距離李政男仔細追憶少年時代三公里的地方，有八百零二位被稱爲「榮譽國民」的退伍戰士領到了一張「戰士授田證」。憑藉這張證書，這群不再有能力作戰的戰士可望於未來的某一場大戰結束之後，得到一塊土地，他們將要在那塊土地上種植小麥、大豆、苜蓿、長生菓、芋頭或者任何可以繁衍、生長、結實的東西。他們從此珍藏起這張證書；有的人把它放在貼身的口袋裡，除了洗澡時置於視線所及之處以外，從不輕離自己的心跳。有的人把它鎖在牀底的箱子之中，四周密布樟腦丸，嚴防蟲鼠嚙食。也有的人把它糊裱裝框、像牌位一般地供奉著，不時想像日後在一塊土地上辛勤播種、耕耘乃至收成的情景。他們在這一日的清晨益發堅定起効忠自由祖國的信仰。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堅定的信仰視爲一種自由意志，而不必理會笛卡兒那複雜辯證中有關無上權力的支配與派遣課題。

多麼重要的一天。我們的李政男則在這一天回到了昭和十一年的六月二十八日，負責偵訊的牛處長溫柔地提醒他：「那是民國多少年呢？」

「呃，昭和十一年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六減一九一一是二十五，那就是民國二十五年啦，是的。」

「那你就說民國二十五年好吧？等一下寫自白的時候也麻煩你寫民國二十五年好吧？」

「當然的，當然的。」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我阿公在原來賣茶葉選有賣豬肉的店面後面買了一塊地，蓋起了屋子，阿公和我的父親就搬進去住。那時豬肉是配銷的，每個人每個月祇能配到四兩肉，我常常看到鄉裡面的人到攤子前面排隊，排很長的隊，來領豬肉。我的父親切豬肉很公平，每個人應該分配多少，不會因爲他是親戚朋友就分配比較多。我父親本來也是刑警，講公平很重要的事，他也教導我們兄弟講公平最重要。我那時才十三、四歲，就瞭解分配要公平，分配不公平就會有很多問題發生。其實那時台灣才剛剛舉行過第一次選舉，每個年滿二十五歲的男性，如果每年繳稅五圓以上，就可以投票選議員。我聽過很多候選人演講，差不多也都在講公平這種觀念。我很重視這種觀念。

但是，我們也可以採取另一種方法——一種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台灣還未曾普遍流傳的方法；去重新閱讀這一頁記憶。如果我們是牛處長——一個在偵訊任何人犯時都保持溫柔情態的胖子；我們會這樣問：「你比較喜歡『公平地分配』呢？還是比較喜歡『分配』這件事呢？」

我們的李政男也許答不出來、也許會這樣答：「公平地分配比較重要。」

「那麼——」那麼我們可以繼續追問下去：「在公平與否之前，是不是要先出現『分配』這件事呢？你如何能夠『公平地分配』而不先擁有『分配的權力』呢？」

我們的李政男也許一時聽不大懂，也許要想一下，然後懂了，然後誠實地答道：「是

的。是要先擁有分配的權力。」

排著隊領取豬肉的人會非常專注地凝視著刀刃切過屠體此一過程；他（她）們也將極其在意：這個月我所能獲取的四兩豬肉的品質，是肥白的部位多一點？抑或是瘦赤的部位多一點？有沒有夾雜著咀嚼不動的碎骨？或者過厚過硬的皮上還殘留著未曾剔刮乾淨卻足以充數斤兩的豬毛？如果我們站在隊伍裡面，以俯視肉案的姿勢仰望公平，仰望分配。如果我們站在隊伍裡面，成爲被分配的一個重要分子，呼吸著昭和十一年夏天炙熱的空氣，這空氣中有我們得以自由吸取而不超僭分配額度的屠體腥臊，有鄰人身上剛剛蒸散出來的泥水汗氣，我們交換著——公平地交換著這樣的體味，並不特別感受到被限制或被剝奪；因爲分配是公平的。分配的公平使我們意識不到分配這件事，也使我們不會注意到：持刀幫助父親切下每份四兩豬肉的刑警身後站著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他每個月也祇有四兩豬肉可吃、他也非常重視公平、他也不明瞭：操持公平的人是分配者。

李政男的祖父和父親遷入新居、爲鄰人分配豬肉的那一年是一九三六年，之前整整三百年，四十歲的笛卡兒正在撰寫他的《方法導論》，他如此寫道：「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公平的東西，就連那些在其他任何事上都最難滿意的人，也不會企求獲得比他現有的更多一點良知。」

良知（Bon Sens）在笛卡兒那裡，是指「良好的理性」；它容或是指正確辨識眞僞的能力，容或也意味著人類智慧的境界。然而，笛卡兒這自許以研究哲學爲唯一職志的人卻經常

提醒自己：「我是不是正在欺哄自己？」「我視爲黃金或鑽石的東西也許祇是一堆銅片和碎玻璃而已。」關於上帝支配與人的自由意志那個話題，我們可以大膽地猜想：笛卡兒爲伊莉沙白公主打的那個比喻也許眞是銅片、碎玻璃，可是，笛卡兒畢竟留下了黃金、鑽石一般閃亮的句子：「我是不是正在欺哄自己？」「我們是不是祇知道自己是信徒、卻不知道自己在撒謊？

黃金、碎玻璃、鑽石和銅片交錯著、拼貼著，以一種名爲自由意志的高度能量散發著人眼無法鑑定、卻爲之眩惑的光芒。那光芒倘若有什麼中心，可能相當堅硬。

這時，我們的李政男緊抿雙唇，走出偵訊室。他的右手寫了太多字而略微有些麻木，然而，在褲袋裡的五根手指頭仍緊緊握著那枚脫落的紐扣。

那是一枚堅硬的紐扣，假設一直把玩在手而不拿出來觀看的話，我們也可能誤會那是一枚金幣的。

第三章　一個失去的字

我們從來沒有比在德國佔領期間更自由過。從說話的權利起，我們喪失了一切的權利，每天我們都受到當面的羞辱，卻必須沉默地承受。隨便加個罪名，譬如工人、猶太人、政治犯，就把我們整批地放逐。告示牌上、報紙上、銀幕上，我們隨處都會碰到我們自己可厭而枯燥的圖像——我們的壓迫者要我們接受的。而由於這一切，我們得以自由。

——沙特（Jean-Paul Sartre）

《沉默的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ilence*）

儘管在哲學上這樣說著，沙特還是覺得不夠自由罷？大戰期間他被德軍俘虜之後，畢竟還是逃獄了。也曾經獲得萊比錫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夏爾馬·沙赫特讀到沙特所寫的這段文字已經是多年以後的事。這個傲倖逃過紐倫堡大審的老納粹卻在一九四八年的「肅清納粹主義法庭」中被判處八年的拘留，不過，一九四九年便獲得假釋。人們推測他兩度擺脫罪責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曾經在大戰末期參與過反希特勒的運動，而且也因之而遭到逮捕。換言之：他曾經背叛過他那邪惡的同志和信仰。

這一次輕微的背叛爲沙赫特個人的晚年帶來某種程度的幸福——他居然還代表戰後的西德政府出任伊朗、埃及和印尼等國的經濟顧問，甚至（當我們的李政男進入台灣大學擔任講師的一九五三年）還在杜塞爾多夫開設了一家「沙赫特銀行」。更妙的是，這個活了九十三歲的老納粹在晚年還成爲巴登—符騰堡州的自由民主黨黨員。

一九六〇年秋，沙赫特到德國西北部的酒鄉希帕雅度假。他騎一輛腳踏車，沿著一片黑森林的邊緣緩緩向北而行。在這一天的日記裡，八十三歲的沙赫特注記了一個「✡」的符號，這是多年以來的第一百二十六個「✡」，它的意思是：「身邊出現了疑似刺客的猶太激進分子」。此處所指的當然是黑森林外的腳踏車之行；然而重要的並非刺客（那疑似刺客的人顯然也並未在當天下手），卻是老納粹在腳踏車上的沉思。「✡」之下，沙赫特寫道：

沙特是對的嗎？在壓迫之下，人類反而獲得自由了嗎？如果他說對了，那麼此刻的我反倒是個囚徒了。我現在品嘗著溫潤香醇的紅酒，揉搓著微帶快感的痠痛的膝蓋，聞得

到小壁爐裡濃郁的松香，可以隨意翻閱韋蘭德的小說、席勒的詩或者我自己豐富的生命記憶。可是，我發現我並不自由，我沒有拒絕權力的自由——像沙特那樣，在心裡說「不」；我最裡面的部分沒有這個字。沒有了這個字，我已經不能思想。沙特也許是對的；他有一個可以讓他說「不」的對象。

如果——如果沙特是對的，那麼，沙赫特長達九十三年的生命裡也祇在他背叛希特勒而遭逮捕的那一段期間成爲自由人。然而，並不是每一個被壓迫者都能獲得沙特所宣稱的自由，許多被壓迫者口中說：「是。」的時候，心裡也常說：「是的，是的。」

沙赫特生命中的最後十年沒有留下任何日記形式的紀錄，在希帕雅度假別墅的腳踏車之旅那一天晚上的日記可以算是這個老納粹此生最後一次書寫的反省。在察覺自己內心深處並沒有眞正的自由——一種本質上的否定能力；之後，他沉默了；據說他甚至再也不肯翻讀自己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生平——七十六年》。就在沙赫特停筆的同一天，我們的李政男也完成了口供，等待獲釋的時刻到來。

這一天台北下了雨，氣溫驟然降低，牛處長遞給李政男一條手工編織的毛線圍巾，告訴他：「這是我們清水生產教育實驗所的學員織的，織得很好。」

「是的。是織得很好。」

牛處長看著李政男把圍巾摺成一塊方方正正的藍豆腐塊兒，不知道是該塞進口袋呢、還是該捧在手裡，便笑了起來：「圍上、圍上。」

屋裡其實相當暖和，但是李政男仍舊照著吩咐做了，一面聽見牛處長和悅溫柔地說：「你大概還不知道：局裡本來要送你到實驗所去學習一陣的呢！我們收了千把個『那邊』派過來潛伏的人在那裡，一面管訓、一面教育，讓他們有自新的機會。成果不錯，成果不錯。」牛處長跟自己點著頭，同時走近前來，替李政男整了整圍巾，讓兩邊垂成等長，再塞進西裝的領口：「他們現在人人都有一技之長了——瞧，這織工眞不賴，嗯？」

「是的。」

「有了手藝，誰還要當匪諜？你說是罷？」

「是的。」

牛處長在這一刻猛抬眼，盯著他看了幾秒鐘，才低聲說道：「總統說過：『中興以人才爲本』。李先生是個人才，政府是不會委屈人才的。你想：我們會把一位農業專家送去打毛線嗎？哈哈哈！」說著，牛處長在那條圍巾上拍了兩下。

我們的李政男在這一刻聞到一股如釘鑽椎刺入鼻的蒜臭，一如夏爾馬·沙赫特當年在紐倫堡聆審之際從隔座的范克那裡聞到的鼻息氣味。歐洲人所不瞭解的中國各地有著不一樣的吃蒜的方法，以及對蒜味的心理解釋。中國大陸地區的北方，人們常生食大蒜。經驗告訴人們：這樣吃蒜，可以祛病強身，甚至增加性能力。在比較講究精緻飲食的南方，菜餚中的蒜多經加工處理，以油漬之、煎之、炸之，有些地區還用大量的糖來醃製蒜料，使之便於下口、脫卻臭味、容易保存。在十七世紀前後由中國大陸南方省分渡海移居台灣的冒險家們爲

這個爾後被稱爲「美麗之島」的地方帶來的蒜頭是一種顆粒較小、味道較強、口感較辛辣的品種，這些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並沒有隨餐生食大蒜的習慣，所以，他們也比較不能忍受自他人口鼻之中噴放出來的、和人體消化器官內壁黏膜或分泌物混合一氣的味道。一九四九年前後，由於一次長期內戰的結束，使得爲數將近兩百萬的中國大陸內陸各省分的移民在短期之內迅速湧入台灣，並且建立了一個試圖反轉內戰結果的統治政權，這些新移民也同時爲台灣這個島嶼國度帶來了豐富的歷史內容：方言、軍隊、憲章制度、博物館典藏文物、黃金、武器、書籍、藥方、蟲囓海棠葉片狀的全國地圖、族譜、從未實現及尚未達成的理想、綢緞、畜牧守則、黨和黨的領袖以及強烈的、濃重的、轉印在遺傳基因之中的蒜味。

早期來台的移民的子孫常以立即停止呼吸這種暫時中斷生命徵狀的方式抗拒蒜味，這種方式並不會讓發出蒜味的人士有那種自覺冒犯了人而產生的被冒犯之感；他們仍舊可以繼續發言、坦然呼吸，並不能體察出對方的不滿。不滿在沉默中醞釀。這正是我們的李政男在聆聽牛處長宣布他的自由之時所做的。

李政男從未丟棄過牛處長親手爲他裹繫的這條圍巾，因爲他擔心日後還會有一次、兩次乃至無數次的偵訊——倘若那偵訊在冬日舉行，偵訊者極可能會問他：「圍巾哪裡去了？丟了嗎？」但是，李政男再也不曾將這條圍巾繞上自己的脖子。

一九六〇年的耶誕夜，李政男的妻子淑米可從衣櫥底層的抽屜裡發現了一粒從西裝上脫落的紐扣和這條圍巾，她把圍巾從一件和式的睡袍底下抽出來，準備讓李政男圍上它、到聚

會所去參加禮拜。李政男突然停止呼吸，搖了搖頭。淑米可說外面很冷，李政男又搖了搖頭，淑米可說你會感冒，李政男轉身走開，淑米可說你莫名其妙。她永遠不會知道：李政男在瞥見這條圍巾的剎那之間聞到了刺鼻的蒜味。

我們的李政男比老納粹沙赫特也許要幸運一點罷？他有一個可以讓他用搖頭表示：「不。」的對象——一條沾染了蒜味的圍巾。圍巾給壓覆在和式睡袍底下，與一粒紐扣一起度過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第一個耶誕節。而這天子夜，李政男坐在聚會所的木板條凳上，聽見證道的牧師講述〈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九至七十五節「彼得三次不認主」的故事。

那是一個關於怯懦、背叛、寬恕和懺悔的故事。曾經以隻手碰觸治癒了彼得岳母熱病的耶穌教導過彼得：必須饒恕敵人七十個七次，而非七次，祂也預言過：彼得即將在雞叫之前的一夜之間三次不認主。那是耶穌生前的最後一夜，彼得的確在耶穌受審的當夜三次否認他認得耶穌。在最後的晚餐席間吃過餅、飲過葡萄汁的彼得如此對耶穌說道：「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然而，他當夜就毀棄了諾言，即使當前來拘捕耶穌的民眾從口音中認出彼得「同拿撒勒人耶穌是一黨的」，彼得也要發咒起誓說：「我不認得那個人。」於是，雞叫了，彼得想起前一夜稍早之時耶穌在餐桌上所作的預言，便立刻走出院子，痛哭起來。

就在牧師口中的彼得走出院子、痛哭起來的時候，我們的李政男則在回憶中走進一九四六年的十月一日，他站在一扇不甚潔淨明亮的玻璃窗前，視線穿越窗外的夾竹桃葉和街道旁

黑瓦遍覆的低矮房舍，落到夕陽和台北市之間的某個空茫的所在。他的手裡緊緊捏著一張尚未填寫一字的「遣返意願調查表」。

這份調查表是從京都帶回來的，在他身邊已經保存了整整一年。當初領表的時候，李政男一共拿了兩張，這顯然是出於一種謹愼行事的習慣。他在填寫第一張的時候其實已經十分仔細，沒有一丁點兒筆誤，雖然下筆勾寫「願意」的瞬間曾因猶豫而略微顫抖，不過，那張表格畢竟還是和另外兩萬三千兩百九十張同樣勾寫著「願意」的表格一起回收到位於日本東京的麥克阿瑟盟軍總部檔案中心去了。

然而，仍然捏在李政男手心裡的這一張空白表格，卻可能會變成一個災難的起點。

李政男在夕陽完全隱沒的同時開始撕毀這張表格，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它碎成沒有任何人可以辨識的許多小紙片之後，李政男還劃著一根火柴，讓它成爲更細瑣的灰粉。

從這一刻起，他將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否認：他曾經在二十一天以前公開展示過這張表格。他會說：「我填過一張，已經交回去了，噩夢般反覆逼臨的偵訊中強調：他從來沒有「脆不回來算了，做台灣人眞沒意思。』」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那天，李政男燒掉了一張表格，以及二十一天前的九月十日凌晨一次大學生集會的記憶。九月十日是中秋佳節，這一天天亮之後十個小時，一次由保安司令部

發起的秘密逮捕行動悄悄展開，被捕者之中的一個人在日後這樣透露：「是的，我記得被捕那一天是中秋節，前一天我還跟李政男在一起。」

而我們的李政男必須否認這個說法。

掌控逮捕權力的壓迫者來了，他們握有並不充分的證據、並不可靠的線索、並不完整的傳聞、甚至並不正確的日期、地點、姓名和事件描述，他們知道：這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像彼得一樣的人類，這些人類無法在心裡對壓迫者說：「不。」這些人類的最內在部分沒有抗拒權力的那個簡單的字；失去了這個字，人類仍然可以「否認」，可以燒掉一張有如空白表格一般單薄的記憶。壓迫者也因之可以任意將民國三十四年十月說成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將三十五年九月說成三十六年四月、將台北的台灣大學說成京都的帝國大學、將叛亂罪涉嫌人的密告認定爲自新人士的懺悔、將塗改記憶以期獲得赦免的懺悔者從叛徒的名單之中刪除。壓迫者從不在意眞相，更樂於見到被逮捕者否認罪行，當那否認的言語正述說著的時刻，壓迫者聽到的是一聲一聲：「是的。是的。」壓迫者因此明白：那個「不」字已經澈底消失了。

第四章　君王降臨

為了城邦的利益，以謊言來欺騙敵人與自己的百姓，是城邦統治者的責任；其他人則不可觸及此一特權。

——柏拉圖（Plato）《理想國》（*Republic*）

那時，這個城邦的統治者已經即將六十歲了，還有五個禮拜，全國人民就要在都市和鄉鎮的通衢幹道上遍插國旗，豎立牌坊，歡慶他的華誕，祝福他活到一萬年之久。倘若他眞地活到一萬年而仍然健在，應該是相當悲慘和痛苦的罷？他的同志、敵人、妻子、兒孫乃至於日睹他領軍打贏抗日戰爭獲致國家統一戰果的景仰者們全都不在了，他還能做些什麼呢？即使歷史的紀錄不至斷裂、扭曲、湮滅，而人們還認得這位老人，專技人士定期來到他身邊，像修剪幕樹那樣爲他修剪指甲，向他行致敬禮，他是否還會爲了城邦的利益而發怒、興奮、怨悔或感傷呢？

還有五個禮拜就要滿六十歲的統治者在這一天——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陰曆八月十四日；對他的妻子說：「想到台灣去看一看。」

被我們稱爲夫人的這位妻子正在吃一顆巧克力糖，她小心地咂著沾在莖丹上的褐色濃汁，說：「馬上走麼？」

「嗯。」

「不好罷？——你要不要也來一塊？」她遞過一塊糖去，早知道對方會搖頭拒絕似地又很快地縮回手來，把糖擱進嘴裡：「不是聽說地方上還很亂？又是賣私貨、又是打架，上半年還有霍亂咪！」

「就是亂才要去。」

「接收清查團的人回來了麼？先問問情況罷？你說去就去，地方上不要準備準備麼？仗

才打完一年——」

「整一年了，到今天。」

「我是說才一年嘛，那裡的老百姓和內員長。你看上個月來的那個什麼光復致敬團，那個丘什麼什麼堂——」

「丘念臺、還有林獻堂吧？」

「不管了，你看他們行禮罷，口口聲聲是『嗨！』、『嗨！』，還是日本話呢！」

「那更要去走一趟了。」

「下個月罷。」

「下個月更忙，南京這邊一天也停不下來；中常會還要討論我這個主席任期的問題。」

「任期怎麼樣？」

「看是不是能延，延到憲法實施之後，依法當選總統就職的時候，這是一件；北邊還有張家口也要命，那邊共軍有個基地還沒打下來。另外就是國慶了，怎麼走得開？我看還是早去早回。」

「早去早回。」夫人又揀了一塊糖，想吃多了，又放下。

「早去早回是對的。」

我們的統治者一面沉吟、一面點點頭。他所統治的版圖實在太大了，因爲版圖太大，城邦之中的每一個角落、角落之中的每一個人民就會相對地顯得小，小到看不出、聽不

見、嗅不著而失去存在的位置。一九四六年的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室裡，統治者桌上的柏曆翻到九月九日這一頁，而統治者的心中並沒有某個日子這樣小刻度、小單位的存在，他所注意的是擁有一百萬平方公里、一億人口、十九個解放區政權、一百二十萬正規軍和兩百二十萬民兵的中國共產黨。從六月間開始爆發的全面內戰已經讓他損失了將近五十萬大軍，他祇能從各種大比例尺的地圖上想像他自己和整個國度的重合關係；當自己的影像在某個區域上顯得模糊、黯淡的時候，他也才會清楚地意識到：那裡確實存在著某些東西——比方說：人民。

四億多人民裡面的一個，此刻正揮舞著一張保存了一年的空白「遣返意願表」、打著酒嗝、搖搖晃晃的腦袋碰著斗室中央懸垂下來的電燈罩子，說：「做台灣人眞沒意思。」

「眞沒意思。」四、五個坐得比較靠近李政男的人這樣應了一句。我們將會認識這些人：他們將要在不久之後組織一個看起來十分秘密、卻又不太秘密的秘密團體。他們稱這個社團爲「讀書會」，又有一個稍微具體些的名稱叫「耕耘社」。其中的某些人將要鼓吹台灣的農民站起來、武裝起來，像二十世紀初的俄國農民那樣擁有正義的知識、反抗的勇氣以及走向理想國度的渴望。另外一些人則被感動著。感動者與被感動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的這天夜裡對於日後的命運全然無知，他們之中有的人將遭到逮捕、釋放，有的人將遭到逮捕、審訊和槍決，有的人避過逮捕、潛逃無蹤，有的人迭經逮捕、審訊、釋放、再逮捕、自新、交代、獲得諒解，然後靠近統治者的位子。

第一次逮捕發生在這次聚會的十幾個小時之後，被逮捕的那人此刻坐在一張破籐椅上看著我們的李政男，以及他身邊幫腔響亮的吳秋白。當衆人的附和聲沉寂下來的時候，他笑著、突然一指吳秋白，說：「你前幾個月才到這裡來，怎麼知道『做台灣人眞沒意思？』」

吳秋白一時不及會意，左右望了一眼，彎曲食指戳了一下自己的鼻尖：「你說我嗎？」

「是啊。」籐椅裡的人扶一下眼鏡，維持著先前那一抹笑容：「吳先生是前幾個月才從廈門來的嘛？」

「不錯。」

「那你怎麼知道、怎麼體會政男說的『做台灣人眞沒意思』是什麼意思？」

在這一刻我們可以察覺：小小的學生居室完全安靜下來，李政男則伸手試著要將仍在晃動不已的鐵皮燈罩扶穩，可是他已經頗有醉意，腳下一踉蹌，燈影晃得更劇烈了。

「彭兄的意思是——」吳秋白環視了一下四周這七、八個面面相覷的傢伙，似乎發現其他的人也不十分理解對方的話語之中究竟埋伏了幾分善意或者敵意，膽子便微微壯了起來：「我不能體會台灣同胞的處境？」

「不要講同胞、同胞這款話好麼？」籐椅裡的人迸出這一句，其他人反而輕聲笑了。

「我當然能體會！」吳秋白拔高嗓門，站起身，像個演說家那樣攤手坦懷地說道：「在蔣介石手底下，哪個省的人民不都一樣『沒意思』？政男兄剛才說那個肥料換穀政策有沒有？怎麼說？「用屎買米」是不是？」